

《儒林外史》与其时代

导师：吴组缃、周强（北京大学） 作者：张国风

《儒林外史》中所描写的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命运，鲜明地体现了十八世纪上半叶的时代特色。这种时代特色集中体现在它与时代思潮的联系和它的政治倾向两个方面。

顾炎武的学说是《儒林外史》主要的思想渊源

吴敬梓生当思想界从明清之际的思潮，向乾嘉汉学思潮逐渐过渡的时期。吴敬梓关于知识分子道路、命运的观察与思考，清晰地显示出这一过渡时期的痕迹。处在两大思潮之间的吴敬梓，既受到明清之际进步思潮的巨大影响，又受到蓬勃兴起、方兴未艾的乾嘉汉学思潮的某种吸引。在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潮中，吴敬梓主要是从顾炎武的学说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顾炎武注重经史、注重历史趋势和社会制度的态度，他对封建社会种种弊端的批判，给了吴敬梓很大的启发，使长篇小说《儒林外史》关于知识分子道路和命运的思考达到了历史的高度。

（一）吴敬梓受顾炎武学说影响的原因

从地理上看，吴敬梓一生活活动，主要在安徽、江苏两省，旁及浙江等地。其中江苏尤为重要。《儒林外史》就是在江苏的南京写成的。十八世纪的两位文化巨人——吴敬梓和曹雪芹，都喝过

秦淮河的水。吴敬梓、曹雪芹都和江苏结下了不解之缘。江、浙是明清时代最富庶的地区。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在这里重迭交错，各种思想在这里竞争、交流，各种学派在这里磨砺着自己的思想武器。江、浙是明清两代知识分子的摇篮。在明清乃至近代的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中，江浙人占有可观的比重。这里学术空气之浓厚，思想之活跃、信息之灵通，可想而知。吴敬梓从保守闭塞的全椒，来到了繁荣开放、人文荟萃、处处得风气之先的南京城，结识了一大批学者文人，才呼吸到了时代思潮的新鲜空气。从而开拓了自己的心胸和眼界，深化了自己对社会的认识，深化了自己的批判意识，并进一步从个人的坎坷和不幸中解脱出来，看到知识分子的整体命运，看到了全社会的腐败和没落。

从吴敬梓与知识界的交往来看。吴敬梓所结识的江南地区的学者文人之中，最值得注意的有经学家程廷祚和程晋芳。程廷祚年青时，热烈地信仰颜、李学说。中年以后，依然欣赏颜、李强调躬行实践的思想。但与此同时，他又是一位顾炎武的信徒和学生。程廷祚对程朱一分为二，对当时排斥宋儒、迷信汉儒的风气深为不满。乾隆元年征辟落选以后，他埋头考经证史、著书立说。在这些重大问题上，程廷祚的思想均有别于颜、李，而与顾炎武一致。程廷祚生活在顾炎武学说最为盛行的江南，他受到顾的影响是十分自然的。这从程廷祚的文集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程晋芳笃信程朱，无法接受明清之际思想家那种尖锐激烈的批判现实的精神。但是，从程晋芳的《勉行堂文集》可以看到，他十分崇拜顾炎武、黄宗羲。他对颜、李有所肯定，对当时知识界一味沉浸于繁琐考证的倾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在《绵庄先生墓志铭》中推崇程廷祚“天文與地食货河渠兵农礼乐之事，靡不穷委探源，旁及六通四辟之书，得其所与吾儒异者而详辨之。盖自国初黄梨洲、顾亭林两先生歿后百有余年，大儒统绪几绝，

继之者惟先生。”程廷祚与顾炎武学说的关系，程晋芳对顾炎武的推崇，均由此可见一斑。

从吴敬梓的经历来看，吴敬梓接受顾炎武学说的影响，有其思想基础。家道的中落，增加了他的阅历，使他对各种虚伪与势利情感十分敏感。来自本阶级的藐视，长期的贫困生活，与很多贫穷失意知识分子的朝夕相处，加强了他的批判意识和叛逆反抗精神。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以程廷祚、程晋芳等友人为中介，吴敬梓自然地接触到顾炎武的学说。吴敬梓在友人和时风的影响下，重视经学。通过治经，吴敬梓加强了他和知识界的联系。尤其是和二程这样受顾影响很深的学者的亲密交往，使他能有很多机会从顾炎武的学说中汲取营养。

明朝覆亡、满族入主中原的社会大变动，震动了每一个中国人，震撼了当时整个的思想界。专制的罪恶、吏治的腐败、理学的无用，均暴露无遗。思想家们目睹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冷酷现实，身受亡国破家的痛苦，他们在痛定思痛之余，即把自己的精力和热情转向对现实、对历史和社会制度的思考。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代表的进步思想家们对封建社会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批判。他们一桩桩、一项项地从历史、从制度的演变着眼，仔细地检查封建国家机器的零件，竭力要找出它的毛病和隐患。他们怀着沉重的历史感伤之情，总结了明王朝覆亡的原因。他们的苦苦探索，归根到底，仍然没有能够冲破儒家思想的传统藩篱。然而，他们对封建社会的广泛批判，那种重制度、重历史趋势而不重个人责任的态度，那种正视现实、探索真理的巨大勇气和魄力，依然给后人以很大的启迪和鼓舞。乾嘉汉学从信念到方法，从研究领域到研究角度，无不受到明清之际思想家的启迪，而注重经史、注重考证的顾炎武则成为朴学大师们最好的榜样，成为连结前后两大思潮的关键人物。清朝统治者抹杀不了顾炎武在知识界的影响。康熙雍正时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

乾隆时编纂的《四库全书》，都收录了很多顾的著作。纪昀等撰写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顾的考经证史推崇备至。连李光地那样的理学名臣都毫不隐讳他对于顾的崇敬。顾炎武成为各派知识分子都可以接受的一面旗帜。这面旗帜不是清朝统治者树起来的，而是在思想潮流的演变中自然形成的。吴敬梓生在这样的时代，他受到顾炎武学说的影响是毫不奇怪的。

（二）从《儒林外史》看顾炎武学说的影响

凡是《儒林外史》中所涉及到的社会弊病，几乎无例外地受到了明清之际进步思想家的揭露和批判。《儒林外史》中抨击最力的八股、科举，曾受到顾、黄、王等人的一致批判，成为众矢之的。顾炎武着重从社会制度、从历史演变的趋势上去寻找社会弊病的根源。他的三篇《生员论》对科举制度的危害作了详尽深刻的批判。程廷祚对统治者的选举制度作了历史的考察，这种考察一直追溯到科举制度尚未产生的汉朝。他批评“汉代人主悬利禄以诱天下通经学古。”他指出，“自科举之制行，天下不复言出处矣”，“此自有科举以来不可变之风尚也。”《儒林外史》则把罪恶和堕落的责任主要地归于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所以，他才能在辛辣无情的讽刺中不时地流露出谅解和同情。吴敬梓笔下的周进和范进给读者留下的主要印象是可怜和可悲，而不是可笑。他们在读者心中唤起的，主要是同情而不是厌恶。

顾炎武十分重视环境和风俗对人的潜移默化作用。他提出“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的观点。他在《日知录》中用大量文字考证了历代风俗和各地、各民族风土人情的差异。程廷祚在《原人》一文也强调了环境、习俗对人的影响。《儒林外史》则令人信服地把人物表现为环境和习俗的产物。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不仅是一个周进、一个范进的真实，而且是产生了周进、范进一类人物的整个社会环境、生活氛围的真实。作者通过梅玖、王惠、胡屠户、张静斋等一大群人物的描绘，通过那些不知姓名的

左邻右舍的描绘，深刻地反映出促使周进和范进在科举道路上苦苦登攀、至死不悔的社会根源，从而有力地突出了人物的社会意义。

科举制度在匡超人蜕变过程中的作用，正是通过环境和习俗的描写体现出来的。可塑性极强的匡超人在环境的诱惑下，一步步往下滑，把父亲传给他的那份农家子弟的纯朴和善良，一点点地全部丧失掉了。

顾炎武竭力主张加强宗法制，主张实行收族之法，要地主阶级向穷困的亲戚施行恩惠。程廷祚的家乡是安徽徽州。徽州是程朱理学之邦，宗族组织严密巩固。程廷祚曾说：“吾乡旧俗，以宗族为重，异于他邦。”他在书信中和族人商榷修订族谱，态度极为严肃认真。宁可得罪族人，也不同意草率从事。吴敬梓在小说中不时流露出对宗法感情的欣赏。他用最诚挚、最动人的文字来歌颂孝悌。

顾炎武把世族的衰落视为世风日下的重要原因。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把宗法关系的松弛、宗法观念的淡薄乃至丧失，视为儒林堕落一个象征。对那些以金钱藐视门第的暴发盐商，以及忘掉自己高贵的门第、去向盐商献媚的世家子弟发出尖刻的嘲笑。对于维护世家尊严、藐视金钱的虞华轩等人，则大加赞扬。

宗法制由父系家长制发展而来，对巩固封建统治有着重要作用。但是，强调宗法制、赞美宗法制的人，往往有其特定的用意和针对性。

明清时期，亦即我国封建社会的晚期，商品经济的发展没能酝酿出政治经济独立的资产阶级。但是，金钱的势力却培养出一批市侩。他们毫无道德上的顾虑，连地主阶级那种虚伪的伦理规范也不愿遵守。利之所在，无所不为。明清小说中出现了一系列的市侩形象（《金瓶梅》中的西门庆、《醒世姻缘传》中的晁源、《梼杌闲评》中的魏忠贤、《儒林外史》中的严贡生、《歧

路灯》中的夏逢若，《红楼梦》中的王熙凤），并且一个个栩栩如生，绝非偶然。《儒林外史》强调孝道、欣赏宗法感情，不是要移孝作忠，而是针对市侩主义的。严贡生身上，集中了作者最大的厌恶和憎恨。

顾炎武的学说带有振兴儒学的复古色彩。既不是程朱，也不是陆王，而是回到孔孟那儿去。这种思想在十八世纪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更加深入人心。乾嘉汉学的考证热潮背后，就隐藏着这一种“复兴圣学、返回孔孟”的思想动力。即是说，程朱陆王都不是真孔孟，必须重新研究孔孟的原著，要从音韵、训诂入手，运用考经证史的方法，弄清孔孟的原旨，恢复孔孟的真面目。就今天的目光去看，这种复古并无多大意义。朴学的实际贡献是为整理庞大的古代文化遗产作了大量工作。程廷祚对程朱陆王均有所批评，对孔孟却极力推崇、深信不疑。他甚至告诫程晋芳“无即以宋人之论语为论语。”从《儒林外史》的基本倾向来看，吴敬梓褒贬人物的标准，不超出传统的儒家思想。小说中备受推崇的王冕、庄绍光、虞博士等人，都是标准的孔孟之徒。《儒林外史》的动人之处，不在于它对真儒的赞美，而在于它对腐儒、伪儒、俗儒的讽刺。在于它那深刻的社会批判，而不在于“礼乐兵农”的美丽蓝图。理想人物的陈旧苍白，反映了理想本身的陈旧苍白。

顾炎武视李贽为败坏礼教、离经叛道的罪人。他在《日知录》中猛烈地抨击李贽：“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贽。”《儒林外史》是和那股以顾炎武为代表的复兴儒学、重新强调封建伦理的思潮相联系，而不是与李贽为代表的晚明个性解放思潮相联系。王玉辉女儿之死，客观上暴露了礼教的残酷、不合人性，具有控诉的效果。但这不足以说明作者主观上已有否定礼教的认识。吴敬梓姐姐二十八岁守寡，一直到四十七岁去世。吴敬梓为了表彰守节孝谨的姐姐，特意请程廷祚

写了一篇墓志铭。在小说中，虞博士为了照顾家计窘迫的杜少卿，将一篇表彰烈女的碑文让给他去做，杜少卿不是十分感激地接受了吗？沈琼枝的形象，作者是从她鄙视富贵奢华和她的才华去肯定她，而不是从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的角度去赞扬她。沈琼枝不反对包办婚姻，也明知宋为富是盐商。她不平的是：“为甚么肯去伏低做小？”吴敬梓反对欺骗性的婚姻、反对买卖婚姻，但不是一般地反对包办婚姻。作者在小说中有意回避男女情爱的描写。凡小说中涉及婚姻之处，无不借以表示当事人对功名富贵的态度，而不是写男女情爱。《儒林外史》中没有爱情的位置。作者将爱情排除在严肃的文学创作之外，他对爱情的看法相当保守。杜少卿解诗，只是将朱熹之说作为一家之言，不等于反对程朱理学。从局部上看，吴敬梓对封建伦理规范有所突破，从整体上看，仍遵守着传统的伦理规范。吴敬梓思想的局限性并未妨碍他对科举制度乃至封建社会晚期的种种弊病进行激烈的批判。顾炎武在伦理观上比较保守，但是，他的社会批判的深度、广度却大大超过了李贽。《儒林外史》中伦理观的保守性和社会批判的深刻性同时并存，亦与此同理。

《儒林外史》的政治倾向

知识分子问题本身具有丰富的现实内容和巨大的历史深度，所以，吴敬梓对知识分子这一题材的深入发掘，必然会涉及到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端。对科举的批判隐含着对政治的批判。

（一）《儒林外史》对当时政治的一般批判

吴敬梓生活在十八世纪上半叶，恰值历史上所谓康乾盛世。康乾盛世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后的一个盛世。康熙、雍正、乾隆，都是励精图治、奋发有为的君主。乾隆时期，清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更是达到了巅峰状态。但是，太平盛世的背后，潜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我国文学史上两部深刻揭露封建社会腐败和

没落趋势的现实主义光辉巨著——《红楼梦》和《儒林外史》都诞生在康乾盛世，绝非偶然。曹雪芹、吴敬梓那种“梦醒了无路可以走”的痛苦和悲哀，表现了现实主义艺术大师对时代本质和趋势的可贵敏感。面对歌舞升平的盛世，吴敬梓看到的是虚伪和势利，曹雪芹看到的是真、善、美的死亡。

吴敬梓把科举和全社会积重难返、无可救药的腐败现象联系在一起进行批判，所以他对科举的批判才那么深刻有力。《儒林外史》中贯串着对功名富贵的否定。吴敬梓视功名富贵为堕落之源，并以此否定觅取功名富贵的阶梯与工具——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小说对功名富贵的否定，隐含着作者对盛世的否定。

（二）《儒林外史》与雍正之治

清朝的帝王们从历代王朝的更迭中，吸取了丰富的统治经验。它的知识分子政策，更是深得历朝传统之真髓。鲁迅曾经用“博大和毒辣”来形容它，真是最恰当不过的评语。清朝统治者一贯的政策是恩威并施、拉拢和打击并重。可是，君主的更迭常常伴随着政策的局部调整，政策的侧重点会有所变化。怀柔为主、镇压为辅——严猛苛刻——外松内紧，这就是康雍乾三朝知识分子政策演变的大致轨迹。雍正时，文字狱明显增加，治罪从严从重，株连宁多勿少。雍正三年，汪景祺《西征随笔》案。雍正四年，查嗣庭试题案。雍正六年，曾静、张熙案，牵涉数省，震动全国。雍正七年，陆生楠《通鉴论》案。雍正八年，屈大均诗文案。徐骏诗文案。范世杰呈词案。雍正十三年，沈伦《大樵山人诗集》案。吴茂育《求志编》案。乾隆一朝，文字狱更多。蓄意罗织、捕杀无辜，真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就诞生在这样一个文字狱最为猖獗的时代。历来的舆论对于嗣位可疑、凌逼弟辈、残害异己，而却有重大政治建树的雍正非常不利。对雍正的非议中，有一些失实之词，有一些正统观念的偏见。野史笔记中关于雍正的记载，其

细节未必一一符合事实，但是，这些记载中所反映出来的社会情绪，却是可信的事实。乾隆上台时，委婉地批判其父的严刻，对于雍正朝历次政治斗争的受害者作了从宽处理，对储位斗争中惨遭打击的宗室表示安抚。乾隆上台采取的一系列翻案措施，在客观上鼓舞了一些官员起来批评雍正之治。《儒林外史》中对雍正朝的尤多不满，不能不说和乾隆之初这一股上上下下的翻案之风有关。《儒林外史》反映了整个康乾盛世的腐败，而对雍正之治尤为不满。

从吴敬梓的经历看。雍正一朝前后，即吴敬梓从二十三岁至三十五岁这一区间，是他一生中最不顺利、思想上最矛盾、痛苦的时期，也是他的思想趋于成熟的关键时期。康熙六十一年，吴敬梓嗣父吴霖起得罪上司、罢官回里。雍正元年，嗣父去世。雍正二年，家难，近房争夺遗产。雍正六年，岳母去世。《读史方輿纪要》一案发，株连到程廷祚。雍正七年，吴敬梓乡试落第。雍正十一年，吴敬梓移家南京，家产日竭。乾隆元年，吴敬梓病辞博学鸿词科考试，从此不应乡试，放弃诸生籍。吴敬梓的挚友程廷祚，对时政颇多不满。他写的《纪〈方輿纪要〉始末》一文中，明显地表现出他对雍正朝的不满。他在给相国陈世倌的信中，把康熙朝博学鸿词科的得人之盛和乾隆朝两次征辟的苛绳隘取、毫无诚意作了鲜明对比，对乾隆所谓求贤作了大胆而露骨的讽刺。

从《儒林外史》来看。《儒林外史》中萧云仙建功受斥、汤镇台奏凯而降级，即是影射雍正朝年羹尧、岳钟琪等功臣受戮被囚一类事件。小说中《高青丘文集》一案，即以雍正朝《读史方輿纪要》一案为素材。小说中风四老爹的原型就是雍正“列名严捕”的甘凤池。吴敬梓将这么一个反抗政府的人写成一个正面人物。泰伯祠祭祀一回，艺术上完全失败。可是，这一回在全书结构上却十分引人注目。作者显然想把它写成全书的一个高潮。在此以

前，人物一个个出场，又一个个退场，描写的中心人物不断地转换。至泰伯祠祭祀，突破了这一格局，一下子将众多的人物集中到一起。祭祀泰伯与颜、李“礼乐兵农”的学说有关。可是，吴敬梓毕竟生活在十八世纪，明清之际思想家提出的种种救世方案，包括颜、李“礼乐兵农”的主张、顾炎武“重氏族”、“用辟举之法”的设想，都已经表现出它们空想的性质。吴敬梓从切身的体验中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赞赏萧云仙青枫城的改革、赞赏真儒提倡礼乐、推崇儒学的救世热忱，而同时又怀疑礼乐活动能否起到矫世变俗的作用。所以，作者在后面大写泰伯祠的迅速破败，隐示理想的破灭。泰伯祠祭祀除了体现推崇儒学的意图，尚包含特定的政治含义。从三十一回到三十六回，世态描写减少，政治色彩加浓。多处穿插民不聊生的描写。三十五回，安排了《高青丘文集》一案。三十四回，借高翰林对杜少卿父亲的嘲笑，巧妙地揭露了信仰崩溃的社会现实。这些描写直接否定了祭祀泰伯表面上的目的。既然象庄绍光、虞博士、杜少卿这样的人才都“做不出甚么事业，”“成就出些人才”又有什么用呢！泰伯的至德就是“三以天下让”。皇位就是最大的富贵。为了争夺皇位，可以不择一切手段。相形之下，受到功名富贵诱惑、走上科举之路的知识分子，不是应该得到某种谅解和宽容吗？臧岐等人虽然热衷名利，但他们毕竟未能得志。祭祀队伍的品流之杂，之所以在全书高潮反而出现了对名利之徒的宽容，其原因恐怕也正在这里吧。推崇儒学、复兴礼乐，反对篡位的雍正，这种思想政治含义，与全书大倡孝悌、否定功名富贵的基本倾向之间的联系，不是十分清楚吗？作者藏起了高潮所需要的激情，将祭祀泰伯与全书基本倾向之间的联系也隐蔽了起来，加上祭祀过程的繁琐描述，使这一回的文字呆滞乏味到了令人难以卒读的程度。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图书馆参考研究部